

東渡東瀛^{注 1}

文／黃俊銘



黃俊銘
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那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留學是個趨勢，離開戒嚴的台灣，在知識和見識上能夠和世界接軌，是種渴望！但大部分學習建築的，都往歐美跑。畢竟台灣的經濟和政治都受美國左右，連思想文化和藝術流行，也都受其影響。但那時，美國能供建築學者拿到博士學位的地方不多，似乎因此種下了台灣建築系的老師，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幾乎是留歐或留日者居多，而學習設計規劃的，以留學美國者居多的因果關係。

我的同班同學，畢業時很多人都計畫要出國留學，但後來台灣邁入經濟的高度成長期，建設殷求，很多人就在台灣安定下來。相對的，這幾年經濟不景氣，也造成出國留學人數銳減，長遠看來，這可能影響台灣與海外專業學術的學習與交流關係。不管經濟或建築的景氣如何，想要完成留學的夢想，還得一鼓作氣。

在我出國留學不久，台灣的情勢開始轉變，解嚴之後的政經社會，也帶動了台灣建築發展潮流的轉變。隨後歐美與日本進入經濟泡沫化的時期，因此在 1990 年代初，除了我之外，是眾多建築學者留學歸國的高峰期。在那個開始重視台灣本土的時代，使這些學者在海外學習所得的先進觀念，得到更好發揮與定著在台灣的機會與養分。

麵包與米飯

選擇留學日本是在研究所碩士班時所作的決定。



2



3

1. 日本筑波大學藝術學群。(照片由作者提供)
2. 日本東京大學建築與土木系館。(照片由作者提供)
3. 日本東京大學正門(舊加賀藩屋敷)。(照片由作者提供)

當時在成大設計方面的李灼明老師和研究所的楊逸詠老師，都是我學習的榜樣。我的碩士論文研究選擇了原住民住居近代化的研究議題，是屬於民族學與建築學的跨領域研究，也可將之歸屬於建築計畫的研究範疇。李灼明老師的風土建築理論給了我一些觀念上的幫助，而楊逸詠老師和吳讓治老師則介紹我看日本東京大學原廣司教授的研究成果。

原廣司是位跨越建築學與數學領域的學者，應用數學的集合學、拓樸學等理論在建築的分析與設計上，調查與比較研究全世界原住民的住居。這對由數學系轉建築系的我而言，喚起了過去對數學的興趣，也開啟了對學術寬廣的視野與未來的想像。加上楊逸詠老師介紹我認識東京大學內田研究室的博士生，協助他們在台灣的田野調查，這些經驗讓我見識到日本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系統性和嚴謹度。

但當時我的兄長已經留學日本，家人比較希望我留學美國，最終決定赴日留學的理由，其實是我無法忍受每天吃麵包的日子。

語言與視野

取得碩士學位入伍當兵期間，我利用閒暇的空檔自學日語。退伍後一邊在建築學會擔任楊逸詠老師的研究助理，一邊在國際語言中心上日語

課程，就這樣建立了日後研究上面日文的基礎。除了以往學習的英文之外，學習日文之後，更加體會不同國家的文化與民族性，尤其是在語文思維與表達方式上的不同，直接影響到研究方法和觀念的迥異。每接觸一種語言，就像打開了通往另一個文化與世界的任意門，也開啟了另一個寬廣的視野。後來長年在日本做研究的經歷，也使得我日後習慣性的以日語文的思維來思考研究的內容。日語文細膩的、曖昧的卻理性而精準的表達方式，成為它自身學術論述的特色。

當時一些日本大學的博士班對博士生的入學資格，要求測驗第二外國語的能力，雖然承認外國留學生的母語也是第二外國語，但也顯示認為外語文能力是研究的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關鍵。後來進入日本的研究室之後，也看到一些人類學的博士生或研究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等國殖民時期建築史的學生，也都先留學這些國家，學習這些歐洲語言，甚至學習殖民地當地的語言，才進入當地調查研究。在我身邊多的是這些懂得多國語言的學者，令人欽佩。

同時我的博士論文選擇了亞洲城市廣域的比較研究，研讀的文獻史料含蓋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在亞洲殖民城市相關的資料。而研究的時間軸連貫 16 世紀到 19 世紀，這使得不同時期的文獻在閱讀上更為困難。雖然

可以藉由過去學者用英文和日文撰述的研究成果，了解部分歐洲古文獻的內容，仍然必須透過一些友人的協助翻譯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的文獻，而自己又得學習荷蘭文，才順利完成博士論文。

歸國之後，我看到過去台灣建築史的研究，多受限在台灣在地的田野與史料的基礎上。台灣從荷西時期開始至今，接受海外建築文化的影響至大，不可能不從廣域的角度來檢視台灣的建築史。日後我就要求研究生盡量要跨出台灣，收集不同語文的史料進行研究，也養成了研究生自學日文，以及到國外收集文獻史料、進行田野調查的習慣。另一方面，我也喜歡收取來自馬來西亞、緬甸、韓國、日本等國的留學生，持續進行跨國與跨語言文化的研究工作。

人脈與山脈

戰後留學日本者，到我這輩已經算是第三代了。我在台灣的學歷背景，從吳讓治老師到楊逸詠老師到我，形成三代師承的脈絡。二位前輩提攜了許多學生到日本留學，影響至今。當時日本東京大學建築系並不承認任何大學的學歷，成大的畢業生能夠順利前往東京大學各研究室深造，靠的是前輩們在東大奠定了學術研究能力的口碑。然後一個接著一個成大的畢業生被推薦到了東大，歸國之後形成了在台灣的日本系統的學術脈絡。

這種人脈關係是進入日本學術殿堂不可忽略的途徑。誰是真正有研究潛力的學生，哪位學生有哪些個性上的優缺點，在推薦信上不容易講清楚、不容易理解的事，在日本的學術界靠著學閥脈絡間的推薦管道，進行著看不見的篩選制度。除了學術能力之外，日本一向重視學者的人格與學術倫理，但這件事實際上不容易靠著後天的教育而改變，使得藉由同學門人脈的保證與推介，以及在收為正式生之前旁聽生的觀察期，成為有效的法門。

因為這樣而形成的學閥，是日本學術界的常見現象，像金字塔一樣鞏固了各領域的學術生產機制。師出同門同校的學者與業界之間，連繫著隱性而緊密的關係，同門師生彼此連帶的責任感與信任感，使得群體性的研究與創作成為可能，但也可能因此限制了個人特質與能力的發展，也可能帶來學閥間的排擠鬥爭，我自己也曾是學閥的受害者。

我原本計畫進入原廣司的研究室，因師長的建議改向筑波大學藝術學專攻的博士課程。因為筑波大學前身的教育大學的教師群，與改制後的教師群之間的派閥之爭，我的指導老師處於下風而被剝奪了收取博士生的名額。無奈之中，才又透過介紹輾轉回到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進入藤森照信老師的研究室。

藤森照信老師卻是個重視個人研究自主性的學者，並不像其他日本的傳統研究室那樣，規畫系統性研究的議題，利用所有的碩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來層疊架構整個學術研究的金字塔。他永遠自己做他自己的研究，強調研究生個人在研究方法、議題、文獻與理論開發的能力。這樣的經驗使得歸國之後的我，在研究室的建構精神上，也較注重學生潛在能力與特質的培育發展，勝於研究領域知識體系的建構。

圈地與漁場

日本建築學會是日本建築專業與學術之間的橋梁，在最初由辰野金吾和妻木賴黃等初代建築家創立它的時候，就設定成為建築相關多元領域者皆可加入的學會。這和當時歐美專由建築家組成的社團極為不同，使得今天的日本建築學會成為組織龐大的學術社團。研究生每年要去參加學會年度的論文發表會，數千篇論文的發表交流，藉此知道還有哪些學者正與自己從事類似的相關研究活動。在這個像似廟會的大拜拜裡，年輕的

學者像在廟前圈地圍出自己的攤位那樣，公告周知自己研究的題目，避免別人與自己的研究重複。

我的指導老師藤森並不熱衷這種活動，他總認為博士養成的研究領域，不是廟會前的圈地擺攤那樣，而是要進入廣大的海域，尋找自己喜歡而別人未曾發現的漁場。學者終其一生的學術生涯，需要有很大的漁場，研究的題材才能源源不絕，研究的視野才能寬闊，研究的能力才能不受限制的發展。

回國之後建立研究室，我也不再依照日本傳統研究室的作法，而是更多設法協助學生探尋自己的方向，在建築專業與學術上發現自我的樂趣與成就。也藉此避免同研究室出身的學生，在研究的領域或專業的能力上過與雷同。期待學生能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與見解，建立自己不可被取代的專業或學術能力，能超越既往已有的成果與成就，未來的世代必須更向前進步才有希望。

走出學術之塔

我的老師藤森照信同輩的學者或建築家，在日本的歷史過程中，是屬於經歷過學運的世代，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普遍的具有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理念。他藉由淺顯易讀的文體，在通俗雜誌上介紹許多建築與都市史的專門知識。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學家、藝術家、博物學家等不同領域的人，組成路上觀察學會，提倡市民關懷生活環境的運動，在追求金錢遊戲功利主義的1980年代裡，以自己的專業能力為社會帶來關懷的力量。雖然因此招致一些傳統學院派的學者，批評他將專業的學術世俗化，走向譁眾取寵的行徑，但他仍然不改專業學術必須為市民服務的理想與初衷。事實上與他年紀相仿的許多日本建築家，也都普遍存在著這樣的思想與價值觀。

在歸國之前，我也自忖作為建築史學者除了理論學術之外，在台灣要如何貢獻自己於社會。



4. 回國後與研究生一同測繪古蹟。（照片由作者提供）

當時台灣的古蹟保存剛在起頭的階段，所以在博士論文研究之外，修習日本古蹟的保存運動經驗，也到古蹟修復現場學習修復實務的技術，回國之後才讓我有能力進行這樣的社會回饋工作，在這個專業領域持續進行理論與技術的整理研究，培育年輕的人才。

後記

這篇像回憶錄般的文章，純粹是個人經驗與認知的整理。如有同屬負笈東瀛而在想法與經驗上有出入者，亦屬必然。隨著時代的改變，現在的日本建築學界與業界的人際關係也在改變，恐怕還得請教剛歸國的學人才清楚。無論如何，現在如果還有學生跟我討論升學進修的事，尤其是將來想要從事學術研究的，我仍會建議他們，只要經濟許可，盡可能選擇出國留學。因為這不僅是個人的學術生涯規劃問題，還影響歸國後建築專業學術領域的系統建構，以及提升台灣在國際間研究水準的問題。■

注釋：

1. 本文2015年2月完成於台灣中壢市，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78期。